



康巴周末

康藏人文

2020年12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组版：陈雪峰

藏族生命美学

「锅庄」词义辨析

扎西次仁

凡是到康定来旅游观光的游客，总爱提这样一个共同的问题：“康定四十八家锅庄的‘锅庄’与藏族锅庄舞蹈的‘锅庄’有什么区别？如果词义不同，为什么都用‘锅庄’这一相同的词汇？”答者大都语焉不详。为此，笔者试图对“锅庄”词义作一辨析，不妥之处万望方家不吝指正。

康巴古为羌羌之地，繁衍生息在这方水土的诸牧人居无定处，逐水草而徙。他们常以三块石头做支锅柱埋锅造食，这种习俗至今在康巴游牧族群中仍沿习。随着社会进步，居住在康区河谷地带的居民逐步进入半农半牧的生产状态，他们开始造屋修房，但是游牧人使用三块石头做支锅柱埋锅造食的习俗，在他们身上并没有改变，只不过他们将在旷野、帐篷里用的三锅柱搬进灶房，在火塘里架设三锅柱。而且，随着社会进步，生产发展，有条件的家庭开始使用特制的石、铁、铜质的三足架做三锅柱了。贫苦家庭仍继续使用三块石头做三锅柱。清人曰：“西康人煮食时，恒以长柱形石头三个埋于土中，如栽桩三根形成三角形，上面置以锅炉，锅柱就形成了。”《羌族史》风俗习惯篇也载：“羌族的住屋中心为‘锅柱’，即火塘上置一铁或铜、石质的三足架（羌语称‘稀米’），用以炊爨。火种万年不熄，有‘万年火’之称。锅柱的上方供奉祖先的神位，平时全家聚会、饮食、接待客人、歌舞以及祭祀祖先等都在锅柱的旁边进行。”我国西南氏羌系的各少数民族也都保留了这一相同的习俗。

清代，汉族文人士将西南地区使用锅柱的山地少数民族居民通称为“锅柱户”，在汉文典籍资料中则又约定成俗的书写成“锅庄户”，用“庄”字代替“柱”字。其“锅庄户”就是“庄户人家”的意思。至今，康东地区仍沿习这种叫法。

康定锅庄从早期单纯的农作型的锅庄户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与商贸活动紧密相连的客棧型锅庄，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其表现形态抑或是其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有关康定锅庄，汉文文史资料中难觅其踪迹，但从其一些零星的文史资料和民间口碑资料中，我们仍能考证出其演变的过程。

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太祖敕封明正土司为“长河西鱼通守远宣慰司”，于是明正土司在原驻牧之地置土目管理锅庄户，建立了自己的基层政权组织。《打箭炉厅志略》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正土司丹增扎巴，率田附十三家锅庄投诚……”查这段史料，率田附十三家锅庄投诚，当然是指只有十三户锅庄户，而是指统领锅庄户的十三家锅庄主，也就是十三家土头。这从《雅州府志》中的这样一段记载可以得到印证。“明正土司，所辖十三家锅庄，头人十三名，共四百六十五户”，这段记载告诉我们二点信息，即“锅庄”是康东明正土司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锅庄”亦是统领锅庄户头目的代称。这种政权组织形式发展到清乾隆年间，就与汉藏茶马互市及康定的特殊地位发生了紧密的关系。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代的“以马易茶”。唐代国势强盛，疆域辽阔，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向唐王朝进贡时，唐王朝以茶行赏，或以“以马易茶”，这就是后来茶马互市的开始。宋元以来中央王朝一直用茶换取少数民族的马匹，以茶易马逐渐形成制度。宋末明初，茶马互市的中心逐渐从北路转向南路。明正土司此时移驻打箭炉，这些土目跟随土司也到了打箭炉。他们是明正土司的侍贡，伺候土司的差遣，为土司服役；又是土司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民政和宗教等一切事务。具有这种特殊身份的土目，既是当地锅庄户中的富裕人家，又是明正土司的代理人，当地藏人于是管他们叫“古曹”，汉语即“代表”的意思。“锅庄”的发音与“古曹”的发音相近，且汉语“锅庄”包含有锅庄户及土头锅庄主的双重涵义，于是，当时的汉人就用了汉语“锅庄”来为藏语“古曹”一词注音。

又据《康定县志》记载：“（土司）其子坚参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堂崇佛，置土目于此，所差侍贡，名曰锅庄。”我想这一记载与上述记载是相吻合的。康定民间传说，康定最早只有瓦斯喇、大院坝、铁门坎及木家锅庄四家锅庄，这四家锅庄是明正土司的家臣，土司家的诸多事务均由这四家办理。甘孜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康定锅庄传闻录”所载中央锅庄主后人的回忆，亦可印证我的考证。

顶草帽

正如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我与我的农民兄弟，谈论的是一顶草帽。
六月、七月，拂身而过，风把草帽从城市头上撞落，于是草帽成为不惹眼的壁挂。
我听到一棵麦子在哭。

只有荷锄者这时深深怀念草帽。这个草帽盛满整个夏季白花花阳光，一窝窝地旋动，旋成圆圈镰道。当镰刀的锋刃触及我的双眼，汗水浸透麦秸让我泪珠饱满。我明白麦子为谁而哭！
深谙农事的哲学，艰辛的劳动是最好的方式。

经过一个夏季的劳作——一顶草帽形成的过程，才明白父辈对一顶草帽的珍惜，才明白草帽是种荣誉，并深深知道：谁才能佩戴这村庄的徽饰。
我与我的农民兄弟，谈论的是一顶草帽——是土地留给我们的共同的兄弟。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藏乡情

藏桔姗姗来迟

温美华

立冬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草木因霜降而渐渐枯萎，残留在树枝上的叶片不时飘飘零零，满目苍黄。沿河两岸的麦田边，一排排郁郁葱葱的藏桔挂满了黄灿灿的桔子，与绿油油的冬小麦构成一幅多彩拼图，装点着大地，使得荒凉的峡谷陡增了沉甸甸的收获感。

南方藏桔气候温和，光照充分，出产丰富。一年中，最先由樱桃敲响水果市场的大门，西瓜、杏子、桃子、李子、苹果、梨子、葡萄、石榴、柿子依季接踵而至，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架势。小城的水果市场从没有萧条过，倒也繁荣兴旺。待到暮秋，百花散尽，冬季来临时，藏桔方才姗姗来迟，以它特有的魅力，带着清香扑面而来。藏桔在当地称之为“甲旭”，意为“长寿之果”。又因其果实外表褶皱多，而被称为皱皮桔。

藏桔树形似伞状，高约十几米，叶片较窄，终年青绿，枝丫处有长刺，果实为扁圆形，形同柑桔，黄果类大小。表面皱褶明显，条状，至成熟时橙黄或黄红色，富有光泽；果瓣月牙型，果肉汁多脆鲜，酸甜可口，维生素C含量高，同时含有对人体有益的黄酮、类柠檬苦素、类胡萝卜素、香精油等。它略带酸苦的特性，是所有柑桔类水果中唯一“不上火而清火”的药食两用品，其独特个性呈现了它特有的价值。而“甜中带酸、酸甜可口、汁多清爽”的适口性让深处高原山地的得荣百姓把它作为解渴的“甘露”和待客的“佳品”。

众所周知，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但凡柑桔类都遵循这一自然规律。金沙江沿岸的藏桔，也因特定的地域而风味迥异。在金沙江、岗曲河、硕曲河、定曲河沿岸一带的亚热带气候区，土地肥沃，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农业耕作历史悠久，这些河谷地区家家户户至今都按照原始育苗方式栽种藏桔，年代久远。河谷以外其他地区则因产地、海拔、土壤和气候等综合因素的不同，果实大小、品质口感如同橘枳一般相差甚远。曲雅贡、古学、瓦卡、奔都出产的藏桔最为地道。

藏桔除果肉清香爽口外，果皮晾干后还可入药，也可以在煲制牦牛肉、羊肉及腥膻味浓烈的家畜肉汤时加以少许，味道特别清香，可以说是五香之外的香料了。

孩提时贪玩，娱乐甚少，惯常会上几个小伙伴在桔子树上攀爬嬉戏，兴致极高，往往可以玩耍至黄昏才回家。物质匮乏的年代，青涩的藏桔总令我们垂涎三尺，当大人不注意时，迅疾摘几个果子吃，足以令小伙伴们解馋。

藏桔要等到打了一层薄薄的霜后再采摘，涩味转变成了微甜，略有淡淡酸味，这时口味最佳。过年等喜庆节日，家家户户都要将藏桔盛盘摆放在桌上供客人品尝，色香俱全，很受欢迎。居住在半山高的村民，不惜远足，备上蜂蜜、青稞、荞面和土豆等高山特有的粮食作物到河谷地区亲朋熟人家中以物易物，当成十分稀罕的珍品带回供家人慢慢享用。

几百年来，藏桔一直默默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经风见雨，兀自挺拨。春天，绽开簇簇白色的小花，掩藏在绿叶中丝毫不张扬。漫长的春夏秋季，它的果实并不起眼，却一直含蓄生长，四季常青的绿叶见证了花开花落，人间冷暖。

藏桔是当地最后成熟的一种水果。旧时因科技不发达，采摘后习惯在自家庭院窖藏，可以存放数月，既可以保鲜，窖藏后又具有别样的味道。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媒介宣传推广，这么好的水果竟然藏在深山数百年而不被外界所知，仅仅在当地市场交易。今年，当地为促农增收，乘乡村振兴的东风，引进了媒体记者和外地区商家，举办了首届藏桔采摘仪式，略加包装后便开启电商配送，线上线下都有出售，远离尘嚣的藏桔才开始走出大山，走向四面八方的藏区，获得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迦颯色迦王的金币

刘忠俊

与友人闲聊，他赞誉过往唐卡传承中的神圣规矩和秘密经验，同时痛恨于现代商业经济使得唐卡变得世俗，甚至成为了商品，削弱了其宗教的崇高感和神秘性。他还说，铜莫会诱使画师的发心、降低唐卡的品质。于是我问他：“你知道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佛像是在哪里吗？”朋友摇摇头。

在印度考古和美史中，佛像初现和佛经记载是大相径庭的。释迦牟尼反对婆罗门教偶像崇拜，他在涅槃前预言说“我死之后要依法不依人，一切以佛法为最高”。当时的信徒遵从释迦牟尼的遗训，所以早期佛教提倡“不立偶像、不著文字”。到了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所建大菩提寺和八万四千佛舍利塔也没发现有佛像遗存和记载。所以，印度历史学家尚未找到一件能够证明佛像

艺术在佛陀时代便已产生的实物。

在佛涅槃五百年后的安达罗王朝，人们开始在早期佛塔“窠堵波”旁装饰石坊并雕刻菩提树、轮子、佛塔、佛脚印、万字纹等浮雕图案来隐喻佛陀及其言行。公元1--2世纪，犍陀罗国王伽颯色迦一世广建佛寺、弘扬佛法。大乘佛教认为弘法需要佛陀形象来引导普罗大众，居住在犍陀罗国的马鸣菩萨撰写《佛所行赞》讲述了佛的一生，《优婆塞戒经》则描述佛陀有“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随形好”，这些都成为佛教造像的理论基础，于是佛造像逐渐兴盛起来，形成了马图拉和犍陀罗两个不同风格的佛造像中心。国王伽颯色迦还发行铸有佛像的金币，金币上有正面而立的佛像，佛陀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携起通肩式佛衣一角，旁边刻有希腊铭文“Boddo”意即“佛陀”。这些金币既是古代犍陀

罗国的流通货币，也作为纪念品埋在“窠堵波”的土层里，成为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佛像。佛像初现在钱币上，是为了弘法而行的方便法门，两千年来佛教并没有因此被锈蚀毁灭，就是最好说明。本体尚不惧，作为佛教用品的唐卡又何惧之有？

再者，佛本生故事中佛陀前世就经历了上百种不同人设的轮回，或为王者、为商人、为女人、为童稚甚至为动物，由此彰显佛门广大和与时俱进。东谷寺珍藏的即卡杰杰名作《如意宝藤》中，佛陀某前世为九色鹿，因搭救溺水者而被出卖追杀，最终善恶有报。这幅画具有典型即卡杰画风，人物造型生动，色彩清雅，再微小的人物也刻画得深入深刻，特别是石青色天空挤出一线悠悠白云，有起有伏、诗意浪漫，堪称康巴唐卡的翘楚！

五色海

第947期



雪中行。范渝 摄

打箭炉

龚伯勋

还有一个是外国人借藏族人之口的说法。

前英国驻打箭炉领事孔贝在1924年5月到达康定不久，根据当地一个叫智慧保的藏族商人（此人便是后来的著名藏学家谢国安，智慧保是他的英文名）的讲述，于1925年8月写成的《藏人言藏》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叫孔明（诸葛亮）的中国将军对野人部落进行了统一的战争，他们其实是苗族，生活在云南、西藏与贵州交界地带，他们的首领是一个叫孟获的人。这场战争打得相当激烈，最后孔明取得了胜利。

在崇州，他发现了许多的其他的蛮人，是真正的孔明，“在经过几番较量之后，孔明把这些人赶出了崇州地区。为了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作为一个足智多谋的将军，他订出和平的条件，即他射出一枝箭，箭射到哪儿，蛮人就要把这块地割让给他。这些蛮人同意了，孔明于是拉弓搭箭，那弓十分有力，射出的箭远远地向西方飞去，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它落到何处。最后，几经搜寻，终于在萨木扎格山找到了它，而萨木扎格山可以俯瞰其北方的打箭炉。原来孔明的密使偷偷地把箭插到那儿的。藏人以孔明一定是个无所不能的神仙，他们只得遵守承诺，把崇州到萨木扎格山的所有地区，都让给了孔明。”这算是“射箭说”吧。

清乾隆年间松筠撰写的《卫藏通志·卷十五·部落》“打箭炉”条中载：“自后汉诸葛亮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往彼处造箭，因名。”书中还提到“郭达山，在炉东北一里，高七百余丈。时有青羊绕山而行，相传汉诸葛亮武侯七擒孟获时，命郭达至炉，于沙哇纳安炉造箭，故名。”在此前，康熙年间吴廷伟撰写的《定藏纪程》中，早已提到：“打箭炉乃孔明造箭之所。”雍正十年奉檄自打箭炉入藏的李世容在《进藏纪程》中也说：“昔诸葛亮武侯征蛮，曾于此造箭，遣一军入监之，厥后成神，立庙享祀，此打箭炉之所由名也。”雍正十二年，奉使秦宁，礼送七世达赖喇嘛回藏的果亲王、允礼也认为：“（打箭炉）本汉旄牛徼外地，旧传武侯铸箭器于此，故名。”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侵藏，朝廷以福康安为大军进藏援剿，受命督饷的四川总督孙世毅，在《受命驻打箭炉筹办征调事宜》一诗的注释中也说：“相传武侯征孟获，命郭达在沙哇地方设炉造箭，故名打箭炉，有祠焉。”道光四年经户部进藏的徐灏，在《西征日记》中也记：“（打箭炉）相传武侯南征，遣将郭达安炉造箭之地。”道光二十四年于二十六年两次进藏的姚莹，在《康轶纪行》中也讲：“诸葛亮武侯征孟获时，遣将郭达造箭于此，故名打箭炉。”咸丰八年编修的《天全州志》还说：“诸葛亮武侯南征凯旋，驻蹕门二载，修兵器于打箭炉”。很明白，这些都该归于“造箭说”。

上述种种传说，都产生于清代，之前的尚未查到。到了晚清，也有对此持否定之说的。光绪四年，奉四川总督丁宝楨委派，赴三藏五印度地方考察的黄琳材，在《西轶日记》中就说得明白：“俗传武侯南征，遣郭达将军安炉造箭，附会无稽。愚按，唐宋之世，吐蕃入寇，斯为要道，或尝造箭于此，至于丞相南征，由嶺入藏，程途各别，非所经行也。”就是说，诸葛亮武侯南征，是在今天的汉源地方过大渡河经越嶲而去，根本没走这条路，哪能绕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设炉造箭？！

西炉史事

所以安炉造箭之说，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唐代，唐蕃曾在长河（大渡河）地方激烈征战，要设在此设炉造箭还沾点谱儿。清末民初任职于川边的查骞，对此也持怀疑态度，在其所著的《边藏风土记》一书中就说：“炉以打箭名，不可考……传蜀汉诸葛亮丞相南征，于此设冶炉，造箭，遂因以名。然无可征（证）也。”就是说，诸葛亮丞相在此设炉造箭，找不到证据。

清季，多次用兵康藏，打箭炉是出入川藏的咽喉，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无他可代。于是，那些旅边的大员和文人墨客，多落脚于此。在这座“开门见山”的边城，闲下来读读《三国》之类，举目那耸立在二水交汇处那座七百多米的高山，不禁触景生情，灵感一动，牵强附会，杜撰诸葛亮遣郭达将军在此设炉造箭的“龙门阵”来摆摆，也是情理之中，就像时下有些地方为了发展旅游，造点假古董，编点“龙门阵”来逗逗游客一样。客观地说，套句眼下的时髦话：这算是古边城当年的一种文化现象吧！足见三国文化对边地之影响。

那“打箭炉”本是原自藏语“打折洛”。藏语“打折洛”就是汉语打（从大泡山而来的雅拉河）、折（从折多山而来折多河）两河交汇的“两河口”之意。把前人将“打折洛”译写成的“打煎炉”的那个“煎”字改作“箭”字，一些文士不就有出头了么？当然这只是笔者一家之言。

依那些个传说，打箭炉始于三国蜀汉时期，那么今天的康定城至少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不过我还是认为按七百年计，较为切合实际。当然，诸葛亮武侯派郭达将军在这里“设炉造箭”，作为“龙门阵”摆摆，传说传说，又未尝不可。